

香港青年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城市创业的影响因素及对策

■ 林逢春 梁静鑫

摘要:本研究基于大湾区内地城市的香港创业青年及其所在创业孵化基地管理人员进行访谈获取质性数据,通过对质性数据展开扎根分析,提炼出香港青年在大湾区内地城市创业的影响因素模型。研究发现:创业动机(营利动机、自我实现动机)直接影响香港青年到大湾区内地城市创业;个体内在因素(创业者个体特征)和大湾区情境(创业环境、创业资源)是动机转化为行为的重要边界条件。建议推进粤港融合发展,以新技术提高创业服务质量,改善大湾区普惠性报道,同时以数字经济驱动大湾区高质量发展,将大湾区打造成为吸引香港青年创新创业的生态系统。

关键词:粤港澳大湾区;香港青年;创业;影响因素;系统思维;“三元交互决定论”

【中图分类号】G647.38;F279.2 doi:10.3969/j.issn.1674-7178.2023.01.010



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识码(OSID)

2019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以下简称《规划纲要》)提出,要在大湾区为青年人提供创业、就业、实习和志愿工作等机会,推动青年人交往交流、交心交融,支持港澳青年融入国家、参与国家建设^[1]。2022年6月,国务院印发的《广州南沙深化面向世界的粤港澳全面合作总体方案》(以下简称《南沙方案》),不但将进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粤港澳大湾区背景下香港青年国民教育的路径研究”(21YJA880006)、2021年度广东省青少年研究课题“香港青年来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城市的创业意愿及引导路径研究”(2021WT037)及广东工业大学党的二十大精神研究校内专项一般课题“文化共同体视域下大湾区港澳青年文化认同建构路径研究”(2022ZXYB10)研究成果。

一步提升青年创业就业合作水平作为发展目标,还把创建青年创业就业合作平台列为其主要任务之一,并明确要营造更优双创发展生态,整合创业导师团队、专业化服务机构、创业投融资机构等各类创业资源,加强创新创业政策协同,构建全链条创业服务体系 and 全方位多层次政策支撑体系等^[2]。因此,打造便利港澳青年来内地城市创新创业的制度环境与发展平台,推进港澳青年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是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学界普遍关注香港青年在大湾区内地城市的创业形势,相关研究主要沿着两条逻辑路径展开:一是从大湾区融合式发展的高度,从宏观层面分析港澳青年来大湾区内地城市创业发展的影响因素,探讨大湾区建设助推港澳青年内地创业的理论关系^[3-5];二是从大湾区优惠政策等制度环境对港澳青年创业激励、心理融合的影响机理方面作出微观分析^[6-7],相关文献为明晰某些单一因素与港澳青年内地城市创业的逻辑关联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考,但对跨层次多元影响因素作用机制的系统性研究还相对欠缺。事实上,人的心理机能由人、行为和环境共同决定^[8],因而创业活动往往是微观个体与外在情境相互作用的产物^[9]。现有研究对香港青年在大湾区内地城市创业的个体认知、行为和情境之间的交互机制缺乏具体阐释,香港青年在大湾区内地城市创业关涉哪些关键性要素和条件?仍有待进一步实证考察。有鉴于此,本文以系统思维视角及质性方法分析香港青年在大湾区内地城市创业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以助力提高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政策效能。

一、研究设计

(一)研究视角与分析框架

系统思维以系统论为理论基础,坚持将事物置于普遍联系的系统来把握,强调从系统与要素、各要素间相互联动的动态机制中探索规律^[10]。粤港澳大湾区背景下香港青年在内地创业存在个体维度、环境维度等多维度关联关系^[11],催生“影响因素系统”的复杂性。从系统思维的整体性、关联性和动态性角度探究香港青年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城市创业的影响因素,是科学看待问题的内在需要。

第一,系统思维的整体性特点,要求将整体与部分有机结合起来理解与把握事物^[12]。现有研究立足粤港两地制度文化差异来论证香港青年到内地发展的现状、影响因素及对策,丰富了学界对香港青年到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城市创业影响因素的认识。然而,影响香港青年在大湾区内地城市创业的跨层次要素及各要素之间的作用机制,还有待进行系统梳理、挖掘和具体阐释。对此,基于系统思维整体性角度理解香港青年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城市创业的影响因素,既可从个体的视角来把握细节和特点,也可从整体的视角来审视局部。

第二,系统思维的关联性特点,揭示了系统是关联性元素构成的一种总体集合^[13]。一般创业情境的青年创业影响因素研究,基于理性行动理论(Theory of Reasoned Action, TRA)、计划行为理论(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TPB)和创业事件理论(Theory of Entr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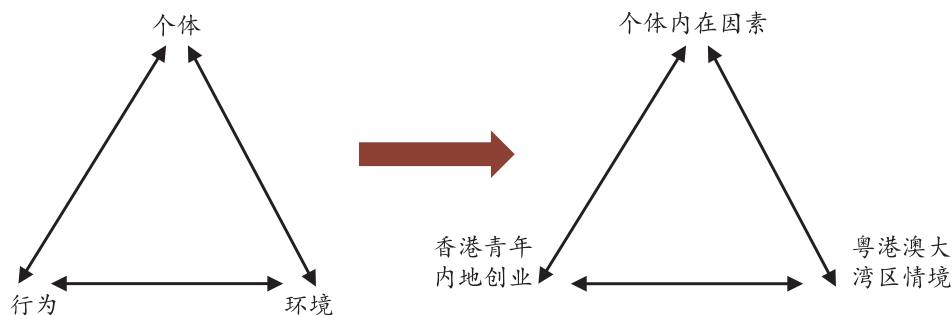


图1 香港青年在大湾区内地城市创业的行为形成分析框架

preneurial Events, TEE)等框架^[14],发现创业影响因素联结为一个集合体,贯穿于创业意愿(动机)到创业行为的全过程。香港青年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城市创业的影响因素系统也不例外,且更需重视相关因素的关联性。因为粤港澳大湾区存在异质社会制度等独特性要素,与其他一般要素叠合构成复杂的新生情境。那么,这一新生情境中,关涉香港青年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城市创业的诸多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如何?这些因素又是如何作用于香港创业青年及其实践?这亟待通过系统思维的关联性角度来加以解答。

第三,系统思维的动态性特点,表征为过程思维、动态思维两方面^[15]。过程思维指将复杂系统视为一个过程系统,比如将香港青年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城市创业这个整体,细化成从创业动机产生到实施创业行为的过程。动态思维强调认识主体要以非线性思维考察复杂系统。现实生活中,事物发展总是不断实践、认识和完善,呈现振荡起伏的特点。为准确把握客观事物的动态性原则,发掘作用于系统边界条件的影响因素很有必要。

综上,香港青年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城市创业可能是“动机—行为”的渐进过程,且需要考虑调节因素对其进行解释,进一步解码香港青年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城市创业研究的“黑匣子”。对此,本文以“三元交互决定论”(Triadic Reciprocal Determinism)作为分析框架。该理论框架由个体、行为与环境三部分构成,从微观视角解释局部要素的相互联系与动态决定关系,契合以系统思维考察香港青年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城市创业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追溯“三元交互决定论”的学术脉络,该理论从属于社会心理学中社会学习理论体系的分支,总体上倾向于将环境、个体、行为三者之间要素视作一个动态的交互系统,以系统揭示社会情境下行为产生的逻辑机制。可见,它适合于相关因素间的实证研究,尤其是能为成因复杂的行为表现做出有力解释^[16]。本文将借此分析框架,从个体、行为与情境分析相关影响因素及其关系(图1),为访谈内容与扎根编码分析提供清晰、可操作的路径。

(二)研究方法 with 资料收集

本文通过半结构式访谈收集一手研究资料,并借鉴扎根理论(Grounded Theory)的编码方法,使用NVivo 12软件进行资料分析,包括开放编码、主轴编码和选择性编码。

本文采用目的性抽样法、链锁式抽样和理论性抽样相结合的策略,在抽样方面遵循三

个原则:一是多渠道确定抽样对象。根据现有文献及专家建议,选取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城市创业孵化基地(器)的香港创业青年为主要调查对象。原因在于,随着广东省大力推进“1+12+N”港澳青年创新创业基地建设空间布局,为响应相关政策的实施,珠三角九市也相继出台了各自的港澳青年创新创业基地建设实施方案。富集优势资源和多重政策利好的各类创业孵化基地(器)降低了香港青年在大湾区内地城市的创业风险,成为香港青年在大湾区内地城市创业首选的“落脚点”之一,截至2020年底,港澳青年创新创业基地共孵化港澳项目698个,带动就业人数8800多人,吸纳港澳青年超1000人^[17]。可见,以创业孵化基地(器)的香港创业青年作为研究样本具有较好代表性。二是在抽样过程逐步增加样本数量及收集信息。一般认为,基地与香港青年的双向互动可实现创新创业资源的充分流动^[18]。本研究抽样包括香港创业青年及其所在基地管理人员,通过对一些香港创业青年和基地管理者开展访谈调研,并经由受访者引荐而拓展至更多符合研究要求的样本。三是合理设置调研地区范围。本研究调研对象覆盖了大湾区内地九市,同时考虑到广州、深圳是最受香港青年青睐的创业目的地^[19],适度增加这两个城市的样本数量。最终,按照理论抽样要求确定30名在内地创业的香港创业青年和9名创业基地管理人员接受半结构式访谈。这些香港创业青年在大湾区内地城市从事教育辅导、信息技术、文创、环保科技等行业,男女比例为7:3,基本符合官方公布的职业分布及性别比例,具有一定代表性(表1)。

香港创业青年访谈样本编码规则为性别+编号;基地管理人员访谈样本编码规则为姓氏首字母+性别。访谈经后期整理后共获得文字材料8万余字。在此基础上,随机从30份创业者组访谈资料中抽取20份(2/3)资料进行编码分析研究,其余10份(1/3)资料与9份基地管理人员组的资料则留作理论饱和度检验之用。

二、研究过程

(一)开放编码

开放编码指以客观的态度将全部资料进行归类 and 命名的过程。本研究通过NVivo 12软件进行编码,在开放编码阶段初步梳理出24个概念(表2)。

(二)主轴编码

主轴编码即在开放编码基础上,依据不同概念间、范畴间的逻辑联系进行归类的过程。本文遵循编码反复与原始材料对照的扎根精神^[20],按照安塞尔姆·施特劳斯(Anselm Strauss)等提出的范式模型中的“条件—策略—结果”逻辑链^[21],探寻若干概念及范畴间的关系,概括出4个主范畴(表2)。

(三)选择性编码

选择性编码重在梳理出脉络条件。本文认为“香港青年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城市创业的影响因素”是研究主线,并能与主范畴建立体系化联系,将多数研究结果囊括在一个

表1 受访对象的基本信息

序号	访谈对象类型	样本代号	创业领域/职务	创业地点/所在基地
1	香港创业青年 (编码规则:性别+编号)	M1	环保科技	东莞松山湖
2		M2	IT技术	东莞松山湖
3		F1	教育咨询	广州天河
4		M3	教育培训	广州番禺
5		F2	汽车贸易	广州南沙
6		M4	创业服务	佛山南海
7		M5	服装百货	珠海金湾
8		M6	影视传播	深圳南山
9		F3	社交电商	深圳南山
10		F4	设计行业	广州天河
11		F5	信息传媒	广州天河
12		F6	建筑工程	广州白云
13		M7	环保科技	东莞松山湖
14		M8	教育培训	广州天河
15		M9	教育咨询	深圳前海
16		M10	软件开发	深圳福田
17		M11	餐饮及服务管理	佛山禅城
18		M12	媒体运营	深圳罗湖
19		M13	旅游业	珠海横琴
20		M14	就业服务	佛山禅城
21		M15	媒体运营	佛山三水
22		M16	装饰装修	广州天河
23		M17	新零售	广州天河
24		F7	文化创意	深圳南山
25		F8	房产投资	中山西区
26		F9	金融服务	江门蓬江
27		M18	金融服务	江门蓬江
28		M19	商业咨询	惠州惠城
29		M20	市场规划	肇庆新区
30		M21	电商	广州花都
31	基地管理人员 (编码规则:姓氏首字母+性别)	Z1女士	干事	广州南沙
32		W先生	经理	深圳龙岗
33		C先生	副主任	深圳龙岗
34		H女士	负责人	深圳南山
35		Z先生	策划总监	广州黄埔
36		Z2女士	招商专员	广州黄埔
37		H先生	执行秘书长	佛山南海
38		Z3女士	负责人	广州天河
39		Z4女士	经理	广州天河

表2 资料分析过程

原始代表性语句	概念	范畴	主范畴
政府给我们提供了许多优惠政策,比如税收和租金减免,每一年还定期发放交通补贴	税收政策	政府优惠政策	创业环境
入驻基地以来,佛山各级政府给我们香港创业青年提供了许多优惠政策,比如租金减免	住房补贴		
根据我们的学历给予不同额度的人才补贴	人才补贴		
香港的地价、人工(工薪)高得离谱,但电子商务、物联网都没有内地这么发达	市场环境	营商环境	
粤港两地有关公司注册方面的法律法规差异,让我们团队扩容等遇到制度瓶颈	法治环境		
政府管理人员和基层人员办事效率高,注册公司等相关手续审批流程快	政务环境		
在距离基地两三千米内还没有人才驿站,为我们解决了住宿问题	生活设施	基础设施	
自从港珠澳大桥开通后,我从香港过来东莞,可以有七种路线选择	交通设施		
银行贷款审批相对严苛和复杂	信用贷款	金融支持	
内地公司法规定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不能有外资的成分	投资融资		
目前两地网络管理制度及网络使用习惯存在差异	网络监管	信息渠道	
使用脸书(Facebook)等了解行业资讯和进行人际交流	信息获取		
有了祖辈父辈的积累,以及我爸爸对我创业“第一桶金”的支持	创业资金	资金	创业资源
企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还仰赖于香港青年前辈的项目信息介绍与推荐	人际网络关系	人脉	
内地懂互联网金融和电商的人很多,能实现团队技术优势互补	技术互补	技术	
寻求与内地从事电商等的科技人员进行技术合作	技术合作		
吸引内地拥有专业技能的科技人才	科技人才		
在大三的时候我就萌生了创业的念头,也经常参加学校的各种创新创业比赛	创业尝试	创新意识	创业者个体特征
喜欢关注一些新鲜的东西,比如有关创新创业类的资讯,开始有了创业的念想	构思创意		
读书期间加入学生社团,与外界的交际也锻炼了市场联络的技能	市场联络	创业能力	
大学创新创业课程的指导和相关比赛的实践,使团队合作能力得到提升	团队合作		
香港青年注重法律条例、比较仔细	偏好	个人偏好	
借着“双创”的契机,就开始申请入驻校内的创业基地,一开始的目标就是团队能有收入	营利	营利动机	创业动机
在内地创业不单单为了赚钱,我希望能做港澳创业青年的“超级联系人”	自我实现	自我实现动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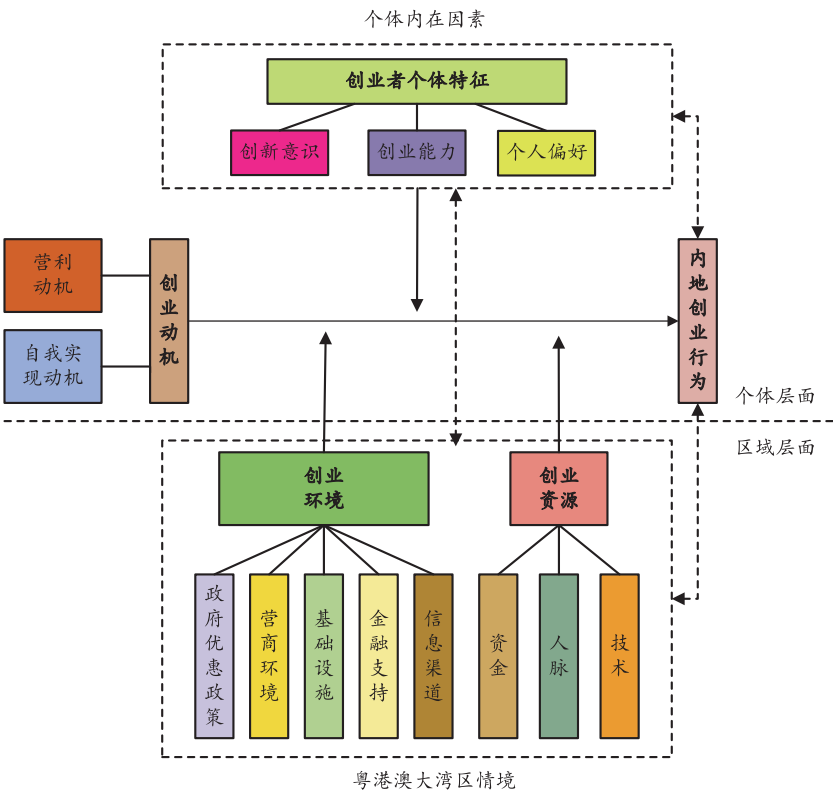


图2 香港青年在大湾区内地城市创业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模型

比较大的理论范围内。经过对原始资料的重审,以及对4个主范畴和13个范畴的反复分析与比较,本文将4个主范畴作为香港青年在大湾区内地城市创业发展的影响因素,再将这些影响因素嵌入“香港青年在大湾区内地城市创业的行为形成分析框架”不同维度,最终提炼出三个理论逻辑(图2):一是创业动机是根本内驱因素,直接影响香港青年在大湾区内地城市创业;二是以创业者个体特征为代表的个体内在因素和以创业环境、创业资源为代表的粤港澳大湾区情境,是“动机—行为”转化过程的边界条件;三是个体内在因素、粤港澳大湾区情境和内地创业行为相互影响。

本文还采用纳雷什·潘迪特(Naresh R. Pandit)在1996年提出的理论饱和检验方法^[22]进行检验。结果显示,4个主范畴均没有发展出新的范畴以及新的关系,理论饱和度较好。

三、模型阐释

(一)基于创业动机因素的分析

模型中,创业动机下设营利动机和自我实现动机,折射出个体低层次与高层次需要,符合香港青年长期接受西方文化教育,在“社会化”进程中形塑出独立型自我建构(inde-

pendent self-construal)的特征,即西方文化推崇个人的成功和价值实现,追求自由的生活方式等行为心理,并希望通过努力来实现自己的不同层次需要。

依据“知情行”理论,个体对某种事物的认知状况,影响到个体对该事物的情感,进而对该事物产生趋近、疏远、接纳或排斥等行为^[23-24]。本文所提的营利动机恰恰折射出香港青年基于对大湾区内地城市创业现状的感知,立足商业利益角度,善于策略性平衡自己对大湾区内地城市的情感认知,形成一种独特的商业化人类情感基础,为其在大湾区内地城市创业行为提供条件。通过访谈资料分析发现,几乎所有创业者以及创业孵化基地的管理人员均提及,商业前景的预期直接影响了该群体创业行为的产生。如在媒体运营领域创业的M12指出:“来这边创业是因为看到大湾区建设带来新机遇,这边有比较大的客户群,运营成本也比较低。”在装饰装修领域创业的M16更是坦陈:“我来这边创业是因为香港房子特别贵,我总得找个活法。”自我实现动机则反映香港青年在大湾区内地城市创业的理想化人类情感基础。如M4表露:“在内地创业不单单为了赚钱,我希望能做港澳创业青年的‘超级联系人’。”

(二)基于个体内在因素的分析

“三元交互决定论”中的个体内在因素,即一种个体特质^[25]。从模型上看,创业者个体特征在“动机—行为”转化过程中发挥调节作用。本文的创业者个体特征主要指香港青年的行为偏好,以及该群体因个人早期的创业训练或实践经历而获得的创业能力和创新意识。

心理学研究表明,个体依据平素经验与先验知识对事物做判断时,会因认知缺陷等形成判断偏差^[26],进而影响行为实施。个体通过对行为偏好进行“积极判断”或“消极判断”,调节“动机—行为”转化过程。消极地判断个人偏好不适应内地城市某些行为规范或习惯,会在“动机—行为”转化过程中制造障碍。比如香港创业青年大多在交流工具使用方面习惯了“采用脸书(Facebook)交流,但内地喜欢用微信,这些差异可能给创业带来不便,影响我跨境创业的决定”(M2);积极地评价个人偏好具有优势之处,往往会在“动机—行为”转化过程中形成动力。比如在解决问题方面,香港创业青年认为“我在香港大多数问题可以自行解决,不需过于依赖一些人情”(M13)。这也使得该群体形成一种自我效能感,一旦具有明确的创业动机时,往往相信自己有“国际视野、诚信度高等优势,可以更好实现抱负”(M21)。又如M10强调了自己看到内地庞大市场时,“没有想太多,只是觉得自己能试一试”。另外,个体通过对创业能力与创新意识的积极或消极判断,调节“营利动机—行为”转化过程。部分创业者在读书期间加入学生社团或参与创业赛事,“使团队合作能力得到提升”(F2)、“在学校申请入驻创业基地,从大三就开始寻求合作搞创新创业”(F1)。这些早期习得的能力与萌发的创新创业意识,无疑成为他们尽早适应内地商业文化环境、纾解“文化震荡”的一个有力避震器。

(三)基于粤港澳大湾区情境的分析

创业是高度情境依赖性活动^[27]。创业情境解释了因国家、地区或其他环境产生的创

业差异^[28]。研究发现,情境线索导致个体对社会内容推断出现“积极推断”或“消极推断”的倾向偏差^[29]。在粤港澳大湾区情境因素中,创业环境因素下设政府优惠政策、营商环境、基础设施、金融支持和信息渠道等二级因素。创业资源因素下设资金、人脉、技术等二级因素。

政府优惠政策特指内地城市为吸引港澳青年来内地就业创业而构建的扶持政策及“一站式服务”保障,具体包括政府为香港创业青年提供的税收和场地租金减免、人才补贴与住房补贴,还有粤港创业孵化基地创新创业专员所提供的报税、注册等服务。香港青年通过对政府优惠政策的积极推断,增强到内地创业的动机。不过,目前不同城市在政策落地和实操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受访者普遍认为相较于其他大湾区内地城市,广州、深圳在财政优化扶持方面更具吸引力,总体上减轻了香港青年在内地创业的经济成本,M6提到“(深圳)比较侧重资金资助和减免”,F6表示“(广州)资金资助(补贴、奖励)政策多一些”。以珠海为代表的一些城市则在政策表述中,更注重通过技能培训的路径来提升香港青年的个体素质,从而促进香港青年创业企业的发展。M13指出,“我们(珠海)除了获得培育支持外,政府更重视给我们提供技能培训和交流”。再如,由于内地城市在加强创业优惠政策宣传的同时未对具体详情进行解读,加之各地政府出台的优惠政策具体措施及准入标准又存在差异^[30],香港青年“难以消化五花八门的政策信息”(M5)。此外,由于各地政府财政情况及其对境外人士管理体制的差异,当前大湾区内地城市在落实相关创业优惠政策时还存在不同程度的操作性难题,这也导致香港青年在“个别优惠政策的申请上存在诸多门槛”(F1、F2)。

营商环境包括市场环境、法治环境、政务环境和人文环境等。受制于香港经济结构和地理空间,香港创业发展与企业运营成本极高,新兴产业发展滞后。相比之下,珠三角地区相对低廉的地租房租和工薪水平,有助于降低香港青年来内地投资办厂的运营成本。更重要的是,珠三角地区营商环境优越、市场空间大、电子商务等新兴产业向好发展,增强了香港青年创业者的营利动机。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是:“我们之所以选择到东莞来创业,其实我们之前就做过一番调研并经过周详考虑。香港的地价、人工(工薪)高得离谱,但电子商务、物联网都没有内地这么发达。而东莞作为珠三角地区的中心,租金等运营成本比香港低好多,且产业链齐备,具有‘世界工厂’之称。如今,华为这个龙头企业都落户松山湖了,证明东莞经济前景良好,适合我们创业。”(M1)但当前粤港两地经济法律的差异,尤其在财税、公司注册等方面的制度差异,增加了香港创业青年在内地创业运营的协调成本。一方面,内地将香港、澳门企业统一视为境外企业,并对这一类企业在教育投资及与内地企业合资方面设有较高门槛;另一方面,目前粤港两地的财税制度差异巨大,特别是在申报税务等具体规程方面,要求大为不同,这为涉及跨境采购的香港创业青年带来不少难题。在人文环境方面,大湾区内地城市利用各自区域内分布的族群文化来召唤香港青年的文化认同。如惠州、肇庆、中山等地方政府重视挖掘岭南文化、客家文化来吸引语言文化相近的香港青年来当地创业,而广州、佛山则力求挖掘广府文化的魅力,加快文化创

意产业的发展,借以吸引生活方式趋同的香港青年来此发展。在广州、深圳、佛山等地创业的受访者认为,生活方式、文化习惯等方面的趋同性降低了自己适应内地城市生活的成本,提升了自己在大湾区内地城市创业的意愿。另有2名在惠州、肇庆创业的青年,直接提到“共饮东江水”“客家乡音”的文化认同影响了其创业目标地点的决策。

公共设施包括交通设施与生活基础设施等。大湾区内地城市完善的公共设施,为香港青年来珠三角地区创业发展提供了便利。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全面启动,尤其广深港高铁香港段的投入运行和深圳湾大桥、港珠澳大桥的正式开通,“一区一路一桥”正发挥叠加效应。对在大湾区跨境互动的香港创业青年而言,自由穿行两地的选择路线更为多样,时间效率更高了。M2表示,“自从港珠澳大桥开通后,我从香港过来东莞,可以有七种路线选择”。

金融支持特指内地银行系统对香港青年在本地创业就业进程中所提供的信用贷款、投融资等金融服务。粤港两地金融监管制度的重大差异,导致大湾区内地城市金融配套政策的支持力度还有待提高。目前内地与香港金融监管制度分属两大不同的法律体系,两地金融服务体系暂未实现关联。在人民币资本项目尚未实现自由兑换的情势下,在涉及香港民众有关人民币的外币贷款、资产业务方面仍存在诸多限制^[31]。如此一来,目前在大湾区内地城市的香港创业青年在货币兑换、贷款和结汇等方面的金融服务需求难以得到满足。M1指出,“涉及跨境资金流动的管制会导致粤港两地公司合作项目遭受资金链断裂的风险”。

信息渠道指香港青年借由网站、社区和自身朋友获取对创业有利用价值资讯的途径。一方面,大湾区内地城市各级政府的政策信息供给与香港青年创业运营中所需的行业信息仍存在不对称的情形。另一方面,一些香港青年的创业管理过程需联动香港等境外客户,或习惯从海外网络媒体了解国际金融与贸易市场信息,但内地基本不使用在香港青年中流行的脸书(Facebook)和照片墙(Instagram)等社交软件,也导致在内地创业的香港青年遇到“信息获取不足”(H)和“交际不便”的问题(Z4)。

资金与人脉等两个因素,是香港青年在大湾区内地城市创业的“加分项”。资金是企业创办的启动必需,而内地人脉则是香港青年在相对陌生城市创业发展的一个助推器。然而,受访者表示,由于资金往来与筹措受制于内地与香港金融体制差异,加上在内地的人脉较为匮乏,企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还依赖于香港青年朋辈的项目信息推介。大多数受访的香港青年创业者对此两大因素持有消极推断。

技术是香港青年创业行为能在内地可持续进行的一个保障因素。一些从事科技类创业的香港青年看好内地的高新技术产业,试图发挥自身“全球视野”和“创新意识”的比较优势,寻求与内地从事电商等科技人员的技术合作,借以补齐自身对互联网经济的业务“短板”。目前,只身赴大湾区内地城市创业的香港青年往往“通过在珠三角地区高校学生群体间宣讲创业经验或推广程序员培训,来吸引一批适合互联网经济、熟悉电子商务的毕业生”(M4),借由这种方式招揽人才,壮大自身事业。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在编码材料分析中,未发现香港青年通过对创业能力、创新意识的积极或消极判断,或者对粤港澳大湾区情境因素的积极或消极推断,进而明显影响到个体“自我实现动机—行为”转化过程。其原因可能是大多数香港青年的项目尚处初创期,通过营利保证自家企业生存成为首要目标;此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尚属起步阶段,在吸纳香港青年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完成自我实现的政策效能上还有很大空间。因此,自我实现动机虽客观存在于香港青年跨境发展的创业动机中,但在企业初创期,个体的自我实现仍属于香港青年创业者的未来愿景。

(四)基于交互作用的分析

依据“三元交互决定论”,个体内在因素、粤港澳大湾区情境和内地创业行为等三大维度是相互影响的关系。在个体内在因素与粤港澳大湾区情境的交互关系上,代表性观点如香港青年在大湾区内地城市创业时感受到“熟人社会”与“人情世故复杂”,“在碰壁后才被点醒,学会培养人脉,入乡随俗嘛”(M15),被迫发生行为偏好上的适应性转变。另外,“香港青年注重法律条例、比较仔细”(M10)等个体特征也影响大湾区营造更加适配该群体特点的法治环境。在个体内在因素与内地创业行为的交互关系阐述上,香港创业青年的自我效能感是其愿意在内地持续创业的一项基础条件。访谈发现,对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城市具有较好观感,且认为逐渐融入并形成自己适应能力的香港青年,更会坚守内地创业。香港青年在大湾区内地城市的创业行为反过来也丰富了创业者个体的内在因素,通过在创业进程中“了解学习制度文化、知识产权、法律法规”,个人在“识别、发现机会”(M9)等方面的创业能力得到增强。在粤港澳大湾区情境与香港青年内地创业行为的交互关系上,从某种意义上讲,大湾区内地城市“强政府”主导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能较好通过制度环境设计来支持香港青年创业行为。此外,香港青年与内地青年的良性互动,有利于香港青年在内地进行创业实践。如M15所言:“我在创业中与内地做外贸的青年小伙伴聊得来,分析分享海外平台的玩法等,获益良多。”香港青年内地创业行为对大湾区情境的影响则集中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影响大湾区内地地方政府及创业基地等部门思考如何提升创业服务质量和破除体制障碍等路径。个别受访者认为,“能感受到内地地方政府是一直有进步的”(M9)。二是将香港优势自发带入大湾区情境。这些创业者认为,“相比内地创业青年,香港创业青年更具创新意识和全球视野”(M21),所以其创业行为可为大湾区内地城市“带来更多香港特色的事物”(M17)并“形成多元化环境”(M11)。

四、结论与对策

本文利用扎根理论质性研究法进行了信息编码,从理论层面建构了香港青年在大湾区内地城市创业的影响因素模型。从系统构成来看,香港青年在大湾区内地城市创业是由行为主体、要素机制、情境三者构成的行为系统。其中,要素机制主要包括:创业动机是香港青年在大湾区内地城市创业的内驱性直接因素;个体内在因素(创业者个体特征)和

大湾区情境(创业环境、创业资源等)是动机转化为行为的重要边界条件;香港青年在内地创业实践中,个体内在因素(创业者个体特征)、大湾区情境(创业环境、创业资源等)和内地创业行为也存在相互作用关系。

该模型还给予我们实践启发,跨层影响因素增加系统复杂度,一旦系统运行面临障碍,应积极通过改变或创造新的系统要素开辟新路径^[32]。据此本文提出如下对策:

(一)推动粤港两地融合,优化香港青年在大湾区的创新创业生态环境

其一,推进大湾区社会协同治理。聚焦香港青年发展需求,利用南沙先行先试的体制优势及其在大湾区几何中心的区位优势,推动人才管理与社保体制改革,使南沙逐步实现与香港在入境、居留和社保等方面规则的有力衔接,切实从教育医疗、金融接轨等多方面全方位为香港青年在大湾区创业发展提供制度便利。调动南沙域内的高等院校、高职院校、科创企业通过合作设立研究院(所)、联合实验室、实训基地等资源力量,以产业联盟、创新共同体和开放基金为主要抓手,加快构建一套区域创新与产业转化体系^[33],满足香港青年在大湾区实现创新创业成果转化的需求。加快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的功能性建设,以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和南沙重大战略性平台为试点,建立健全粤港澳三地经济法律相互融通的体制及协调机制,从而提高香港青年来内地创业发展的归属感。其二,以数字技术完善港澳青年创新创业孵化平台建设,提升创业服务质量。依托大湾区内地城市精良的大数据分析系统,精准分析香港青年就业创业的动向、行业发展形势及其共有需求。运用云技术、人工智能,加快大湾区众创空间建设,为香港创业青年提供创新场地、创业辅导、资源对接、产业链支撑及技术、咨询与投融资服务等支持体系,提高香港创业青年的适应力与获得感。

(二)遵循香港青年行为偏好,丰富大湾区宣传题材与语言传播方式

大湾区媒体应聚焦香港创业青年群体行为偏好,利用“两微一端”平台和生活化传播模式,加强大湾区内地城市人文景观与风土人情的报道,以此调动香港学生来内地考察与实习交流的兴趣。此外,珠三角媒体可联同《大公报》《文汇报》等香港媒体,共同发掘一批符合香港青年需求的案例题材,传播大湾区好故事。一方面,借助粤港两地专家学者与智库的视角,解读大湾区的政策走向与行业信息,让香港青年能理性看待大湾区的政策理念,从中习得跨境文化沟通能力。另一方面,加强有关在大湾区成功创业的香港青年的案例宣传,以“现身说法”的访谈、沙龙论坛及专家点评等丰富形式,增进香港创业青年对大湾区普惠性的政策认知。

(三)加强湾区的科技交流与公共服务,助力香港青年创新创业的可持续发展

首先,加强内地商会等民间组织的培育及其与香港广东青年总会等爱国爱港社团组织的交流,定期组织邀请香港政、商、法等各界青年精英参与大湾区内地城市举办的青年论坛、广交会和文博会等重要信息交流平台,增进香港青年对大湾区建设的政策认知。其次,发挥好在内地成功创业的香港青年所扮演的“超级联系人”的角色功能,让这些“意见领袖”深入两地高校、商会传播大湾区的好故事,推动更多香港青年参与大湾区建设。最

后,健全粤港澳大湾区创新创业竞赛和科技交流项目体系,实现粤港青年在信息互通、科技创新方面的交流合作,使得香港创业青年得以拓展社会资本,并分享大湾区内地城市先进的科技成果。

(四)以数字经济驱动大湾区的高质量发展,为香港青年内地创业培育新机

第一,大湾区内地城市应加快推进数字基础设施、数字要素市场和数字产业链条的建设,通过利用数字技术打破时空限制和产业边界,组织泛珠三角、带动大西南地区资源要素流通,促进国内规模市场的形成和内需潜力的释放。同时,以数字金融的行业布局为抓手,积极参与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m-CBDC Bridge)项目建设,为创业主体参与重构全球产业链、贸易链创造资本市场竞争优势,提高香港青年对内地城市战略价值的认知,增加他们融入内地谋求创业发展的信心。第二,打造大数据驱动的区域创新与产业转化体系,实现数字科技人才环流与高端创新资源高度集聚,创新实施“居住在港澳、工作在内地;科研在港澳、转化在内地”等模式,激发香港青年赴内地寻求创业发展新增长点,携手内地青年在数字创新创业领域开展科创合作。

结语

综上所述,香港青年在大湾区内地城市创业需要个体层面与区域层面的物质匹配、情感互动。这要求我们重视观察跨层次、多维度的交互作用。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一是以系统思维为研究视角关注香港青年的跨境创业行动,遵循扎根理论所规定的编码程序而构建出有关影响因素理论模型,这既彰显了系统思维在指导理解、应对事物系统效应方面的解释力,也丰富了系统理论的研究议程;二是运用“三元交互决定论”及质性研究方法,系统分析香港青年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城市创业的影响因素,从中甄别出一些影响该群体跨境创业的关键因素及作用机制,为推动香港创业青年融入国家共荣发展及推动粤港澳大湾区的高质量发展提供决策参考。

参考文献:

- [1]《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N],《人民日报》2019年2月19日第1版。
- [2]《国务院印发广州南沙深化面向世界的粤港澳全面合作总体方案》[N],《人民日报》2022年6月15日第1版。
- [3] 郑益奋、刘家裕:《澳门青年粤港澳大湾区创业探析》[J],《广东青年研究》2022年第2期,第125-132页。
- [4] 郑梦婕:《粤港澳大湾区视阈下港澳青年融入国家发展路径探究》[J],《广东经济》2021年第12期,第20-27页。
- [5] 王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背景下港澳青年到内地发展的现状、影响因素及对策建议》[J],《厦门特区党校学报》2019年第3期,第58-63页。
- [6] 何铭欣:《基于史密斯模型的粤港澳大湾区青年创业政策扶持效果探究》[J],《商展经济》2023年第1

期,第106-108页。

[7] 傅承哲:《港澳青年跨境发展的心理融合行为结构测度及其政策启示》[J],《城市观察》2022年第4期,第137-158、164页。

[8] Bandura Albert, *Social Learning Theory* [M], Englewood Cliffs: Prentice-Hall, 1977.

[9] Frank M. Fossen, Thorsten Martin, “Entrepreneurial Dynamics Over Space and Time” [J], *Regional Science and Urban Economics*, 2018, 70: 204-214.

[10] 王萍:《系统思维:习近平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思维方法》[J],《系统科学学报》2020年第2期,第79-83页。

[11] 梁燕、王嘉茵:《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背景下内地高校港澳学生创业意愿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培养创新型人才视角》[J],《科技管理研究》2021年第12期,第149-156页。

[12] 王帆:《复杂系统思维的整体观与中国外交战略规划》[J],《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9期,第145-154页。

[13] 梁静鑫、祁明德、刁衍斌、张育广:《“产学研”:新工科人才培养工程实践系统的优化机制》[J],《系统科学学报》2022年第2期,第105-109页。

[14] Olawale Fatoki, Lynety Chindoga, “An Investigation Into the Obstacles to Youth Entrepreneurship in South Africa” [J], *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search*, 2011(2): 161-169.

[15] 周杨:《系统思维视域下的“五位一体”总体布局解读与建设》[J],《系统科学学报》2014年第1期,第48-52页。

[16] 吴遐、高记、刘兵:《以评促学:基于三元交互决定论的同伴互评研究》[J],《中国远程教育》2020年第4期,第58-64、77页。

[17] 何立峰:《深化粤港澳合作 推进大湾区建设》[J],《中国产经》2021年第11期,第20-25页。

[18] 陈铤、吴伟东:《港澳青年跨境就业创业政策研究——基于广州、深圳、珠海的政策对比分析》[J],《青年探索》2021年第2期,第89-101页。

[19] 光明网:《香港青年创业调查:广深珠成除香港外最受欢迎城市》[DB/OL], 2021年8月17日, <https://m.gmw.cn/baijia/2021-08/17/35087397.html>, 访问日期:2022年11月10日。

[20] 贾旭东、衡量:《基于“扎根精神”的中国本土管理理论构建范式初探》[J],《管理学报》2016年第3期,第336-346页。

[21] Anselm Strauss, Juliet Corbin, *Grounded Theory in Practice* [M], Thousand Oaks: Sage Publications, 1997.

[22] Naresh R. Pandit, “The Creation of Theory: A Recent Application of the Grounded Theory Method” [J], *The Qualitative Report*, 1996, 2(4): 1-15.

[23] Nico H. Frijda, “The Place of Appraisal in Emotion” [J], *Cognition & Emotion*, 1993, 7(3-4): 357-387.

[24] 陈小琴、陈贵松:《森林康养公众认知、情感对行为意向的影响研究》[J],《林业经济问题》2020年第4期,第412-418页。

[25] 班杜拉:《思想和行动的社会基础——社会认知论》[M], 林颖等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年。

[26] Klaus Fiedler, “Beware of Samples! A Cognitive-ecological Sampling Approach to Judgment Biases” [J], *Psychological Review*, 2000, 107(4): 659-676.

[27] David A. Whetten, “What Constitutes a Theoretical Contribution?” [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989, 14(4): 490-495.

[28] Ted Baker, Eric Gedajlovic and Michael Lubatkin, “A Framework for Comparing Entrepreneurship Across

Nations”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2005, 36(5): 492-504.

[29] 代涛涛、佐斌、温芳芳:《情境线索对社会认知内容推断的影响》[J],《心理科学》2019年第3期,第612-618页。

[30] 林至颖:《香港青年赴粤港澳大湾区创业的机遇、挑战及应对》[J],《港澳研究》2018年第1期,第55-62、95页。

[31] 孙涛:《香港路径与金融稳定——论全球化时代的香港与内地间的跨境资本流动》[D],博士后研究报告,中国社会科学院,2005年。

[32] 叶怀义:《创造,需要以系统思维为指导》[J],《系统科学学报》2019年第1期,第98-101页。

[33] 谭锐:《南沙创新和产业转化需要“三个面向”》[N],《广州日报》2022年6月29日第A5版。

作者简介:林逢春,广东工业大学数学与统计学院/粤港澳大湾区科技战略与价值协同研究中心副教授。梁静鑫,广东工业大学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李 钧